



空海入唐——佛学之旅与文学之旅

■ 卢盛江

日本高僧空海(774—835),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;空海入唐,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重要的事情。海上航行有数不尽的艰难,常常要在风暴中漂流数月,甚至遇难而死,虽有不少人借故逃避,但平安时代更多的日本人为了学习先进的唐文化,不辞艰难,不顾危险,前赴后继,随遣唐使入唐。空海正是上书自请,于804年随第17次遣唐使入唐,忘身衔命,冒死入海,七月六日从日本出发,第二天就遇上暴风雨,穿帆折舵,在海上漂泊34个昼夜,八月十日始漂至福州长溪县赤岸镇,又经数月旅途颠簸,于十二月始抵长安,尔后于806年八月离唐回日本。

空海入唐,无疑是一次佛教之旅。空海本来就是重要的佛教人物。他年青时对佛学就有相当高深的造诣,12岁即以奉佛礼为事。15岁入京,即于石渊寺访僧正勤操和尚,受虚空藏求闻持法。18岁作《葺誓指归》,后改写定名为《三教指归》,解释儒、佛、道三家不同的思想要旨,表达学道的决心。20岁,在勤操僧正主持下,于和泉国槇尾山寺剃度受沙弥戒。22岁,于奈良东大寺坛院受具足戒,法名空海。此后至入唐的数年间,空海遍游日本名山,访师求法,钻研佛典。空海入唐后,也把主要精力用在佛教的访道求法上。入长安后,次年(805)二月十日,他移住西明寺,开始历访诸寺名德。五月上旬,访青龙寺,首次进谒佛教真言宗第七代教主惠果高僧。六月上旬,受胎藏法灌顶。七月上旬,受金刚界灌顶。



八月十日,受传法阿闍梨位灌顶和遍照金刚的灌顶名。这年十二月十五日,惠果圆寂,次年一月,空海参加葬礼,为惠果撰写碑文。这一系列活动之外,他还废寝忘食地抄写经书。他写有《与越州节度使求内外经书启》,说他在长安写经论疏等凡三百馀轴,还有大悲胎藏金刚界等大曼荼罗尊容。他写的《与本国使请共归启》,也说他写有图胎藏大曼荼罗一铺,七幅丈五尺金刚界九会大曼荼罗一铺,还有新翻译经二百卷。他说他是竭力涸财,衣钵竭尽,不能雇人,忘餐耽读,假寐书写。他在长安不到一年时间,那么多的经论疏之文,那么多那么大的曼荼罗尊像,都要抄写图画,他为佛教事业真是竭尽了心力。正因为这样,他回日本之后,就传教弘法,开创了日本真言宗,成为日本一派佛教之祖。

但是,空海入唐,同时也是文学之旅,而这一点,以往不被人们注意。

空海本来就有很深厚的汉学文学修养。传空海《御遗告》自述,他幼年跟从外舅学文章。从他《聋瞽指归》看,他很早就读过初唐文人张鷟的著作,读过魏王粲的《登楼赋》和东晋孙绰的《游天台山赋》、郭璞的《江赋》和木华的《海赋》、晋陆机《文赋》,还有三国吴韦曜的《博奕论》、东汉末赵壹的《刺世疾邪赋》、南朝宋谢惠连的《雪赋》,还有西晋潘岳和东汉蔡邕的诗赋,而这时他才18岁。空海还明确谈到“八病”问题。虽然他最终选择三界无家、六趣不定之路,但他对汉学诗赋文章有着同样浓烈的兴趣,对中国诗赋文章已有相当修养。也正因为此,空海入唐,在佛教求法活动的同时,也有值得注意的文学活动。

福州是空海入唐的第一站,从现有史料看,空海在福州主要是争取入京,但他已有了值得注意的文学活动。一是代大使作书呈于唐州官。空海一行四船,遇上暴风雨后在海上漂泊34个昼夜,却漂至福州长溪县赤岸这样一个偏远小镇,颇费周折,始到福州。日本大使自作手书,三番两次呈于州司,州司不但不应,反而封检舟船。大使不得不延请空海代书。空海代书呈上,则不但使主人疑虑顿消,而且还优礼相待。何以如此,既因为空海此文态度诚恳,谦恭得体,讲明如何经历海上险难漂泊至此的原因,也因这篇文字的文采,对仗工稳,比喻贴切,文辞巧丽,是一篇文采斐然的标准骈俪美文。这是空海入唐第一次展示他的汉学文

学修养。

二是作离合诗,并与马摠交往。据《性灵集序》,空海作离合诗,赠土僧惟上。而前御史大史泉州别驾马摠也送诗予空海,诗云:“何乃万里来,可非銜其才。增学助玄机,士人如子稀。”这里称马摠为“前御史大夫泉州别驾”,马摠是受宦官监军薛盈珍之讐而被贬为泉州别驾的,事见元稹作《薛戎碑》,又见两唐书《马摠传》。据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,泉州归福州中都督府所督。既称“泉州别驾”,则当在福州,空海作《离合诗》和马摠送诗,都应该在福州。这里所说的空海所作离合诗,见《性灵集》圣范集注引,作《在唐日作离合诗赠土僧惟上》,诗一题又作《在唐日示剑南惟上》。诗曰:“磴危人难行,石嶮兽无登。烛暗迷前后,蜀人不得灯。”空海把诗中前句头一字拆开字形,分离成另二字,而分置于后一句的首尾,谐意蜀人不得登,则蜀僧能登,惟一蜀僧能登,而寓“蜀僧惟上”之意,点明剑南僧之名“惟上”。空海选择作这种诗体,应该是有意识地表现自己的作诗技巧和汉学修养,以与当地文人交往。

唐贞元二十年(804)十一月三日,空海从福州往长安,十二月二十三日入长安。这是空海入唐的第二站,也是空海入唐文学活动第二个值得注意的地方。

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:空海在当时长安和哪些文人有过交往?有些文人这时不在京城,如韩愈、孟郊、灵澈、陆贽、吕温,但很多文人如皇甫湜、柳宗元、刘禹锡、沈传师、李宗闵、牛僧孺、杨嗣复、陈鸿、杜元颖、萧籍、陆畅、李绅、李顾言、李虞仲、崔玄亮、李复礼、马异、窦群、庾敬休等,这时都应该在京城长安,但是没有资料证明空海和这些文人有交往。最有机会相见的,可能是元稹和白居易。日本学者太田次男专门著文《白乐天与空海》,讨论白居易与空海在长安可能有的关系。803年春,元、白同授秘书省校书郎,这之后,到806年四月同登才识兼茂、明于体用科,元稹授左拾遗,白居易授周至尉,这期间,和空海同在长安。白居易这时居永崇里的华阳观,而空海居西明寺,在街西的延康坊,后来去青龙寺,在街东的新昌坊,相距都很近。永贞元年(805)春,白居易还去西明寺观赏过那里的牡丹,写有《西明寺牡丹花时忆元九》,这时空海就在寺中!白居易还写有《青龙寺早夏》,太田先生认为这诗也可能作于空海在青



龙寺的时候。在不大的寺院里,白居易可能会知道空海的名字,太田先生的这些分析都是有道理的。其实还可以补充一些材料。元稹作过《西明寺牡丹》,还写过《寻西明寺僧不在》,说明元稹不仅去西明寺观赏过牡丹,还拜访过寺里僧人。这两首诗都当作于元和元年以前,也就是说,正好是空海居住在西明寺的时候。他们确实有可能相见。但是,可能毕竟是不可能,没有材料证明他们已经相见!他们当时都正值三十多岁的英年(白居易比空海大二岁),一位是中国中唐元白通俗诗派的代表诗人,一位是日本密教真言宗的创始人,虽同在长安,而且就同在西明寺,咫尺之间,可能擦肩而过,失之交臂。

空海在长安的主要精力,在寻道求法。即使这样,空海在京城也进行了一定的文学方面的交流。他和青龙寺义操阇梨有诗歌交往。《经国集》卷10载有空海所作《留别青龙寺义操阇梨》,诗云:“同法同门喜遇深,游空白雾忽归岑。一生一别难再见,非梦思中数数寻。”这是在京城所作。《性灵集序》又载毗陵子胡伯崇之歌:“说四句,演毗尼,凡夫听者尽归依。天假吾师多伎术,就中草圣最狂逸,不可得,难再见。”空海在京城从韩方明学书法,当也展示了自己的草圣之才,因此胡伯崇称赞他:“就中草圣最狂逸。”

有更多文学活动的,是离京之后的越州时期。他和朱千乘、朱少端、郑王等诗人与昙靖、鸿渐等僧人有赠诗。朱千乘等人赠诗空海应当在越州,时间在806年春天。这几位作者,朱少端为越州乡贡进士,朱千乘曾居越州别业,昙靖、鸿渐为越州僧人,郑王为越州士人。朱千乘诗序说:“勾践相遇,对江问程,那堪此情。”勾践为越王,这里代指越州。这应该是越州所作。朱千乘诗序说:“元和元年春沽洗之月”,“沽洗之月”为三月,知空海这时已在越州,和这些文人赠诗交流,就在这年三月。诗序说:“去秋而来,今春而往。”所谓“去秋”,不当是指去年之秋,而是指往年之秋。因为空海不是去年之秋入唐,而是前年之秋。这里说“去秋”,与“今春”紧切相对,是恋惜之意,惜其在唐时间太短。

他向越州节度使求内外书,从《与越州节度使求内外经书启》看,他所求之书,佛教经律论疏传记之外,还有“诗赋碑铭”。

空海为什么要在越州求内外典籍?可能因为长安寻道求法活动太

频繁,时间太紧张,加上日本派使臣催促回国,在长安来不及做这件事。另外,也可能因安史之乱后,文人多聚集江南。比如,大历年间,江南有浙东诗人群和浙西诗人群。江南也成为文学活动的重要之地,因此唐人著作在吴越一带多有流传。比如,宝应元年(762)李白卒,当涂令李阳冰编其作品为《草堂集》十卷,这个集子可能很快传到湖州一带,因为大历中皎然以擅长七言歌行而著称,而其七言歌行多仿效李白,这可能与《草堂集》很快在湖州一带流传有关。皎然《诗式》卷3选有杜甫《哀江头》,这是唐人选本中最早选录杜诗者,这也可能因为杜甫作品较早流传在江南一带。空海之所以选择越州求内外书,应当与这种情形有关。

空海入唐,携回日本献给天皇的东西中,有不少文学作品集和诗学著作,据《书刘希夷集献纳表》和《献杂文表》,有《刘希夷集》四卷、王昌龄《诗格》一卷、《贞元英杰》六言诗三卷、《王昌龄集》一卷、《杂诗集》四卷、《朱昼诗》一卷、《朱千乘诗》一卷、《王智章诗》一卷。另据《敕赐屏风书了即献表并诗》,《古今诗人秀句》二卷也当是空海携回日本的。空海携回日本的唐人著作还有崔融《唐朝新定诗格》、元兢《诗髓脑》、皎然《诗议》。

这些著作中,有些当得之于越州。朱千乘与空海在越州有诗相赠,《朱千乘集》一卷当是在越州时为朱千乘所赠。据《唐才子传》卷5,朱昼为广陵人,疑其诗多流传于广陵吴越一带。皎然主要生活在吴中湖州一带,他的《诗议》当主要流传于此间。若然,则《朱昼诗》一卷和皎然《诗议》也当得之于越州一带。

一些著作,可能为越州刺史所赠。据《旧唐书·顺宗宪宗本纪》,永贞元年(805)十月丙午,以华州刺史杨于陵为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。空海上启求内外经书的越州节度使就是这位杨于陵。这位杨于陵是一位颇有政声的地方守宰,不以能文闻名,却也有诗三首存世,见《全唐诗》卷330。其诗虽称不上上乘佳作,却也比喻新颖,对仗工稳。《全唐文》卷523、《文苑英华》卷598载杨于陵《谢恩宣慰并赐手诏表》,其中说到接待日本国使,说的应当就是在越州接待空海一行之事。他说接待规格,遵循旧例,并且稍加丰备,以副怀柔之意。从这数句来看,这位越州刺史是满足了空海求内外经书的请求的。



可能为寻求内外之书,空海在越州又停留了较长时间。如果朱千乘等人赠诗确在越州,则空海至少在这年三月就已到了越州。《与越州节度使求内外经书启》之末署明年月,作于元和元年四月,说明至少这时空海已到了越州。而据《高野大师御广传》和《弘法大师行化记》,空海到这年八月才登舟启程回国。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日本呢?我想,空海本来就想在唐多停留些时日,只是日本派人来接,才不得不离开长安。到越州之初,本也打算马上回国,所以有朱千乘等唐文人相送赠诗。但空海转而又改变主意,决心不废弃难得的入唐机会,要继续在唐求内外经典之书,所以才有与越州节度使之启。到八月回国,计有四五个月时间。这四五个月的时间,空海在做什么呢?很显然在求内外之书。他带回日本的那些文学类书,很多应当就是停留在越州的四五个月的时间里寻访得到的。

这样看,完全可以称空海入唐为文学之旅。他回日本后编《文镜秘府论》,他后来的汉诗创作,恐怕都与他入唐的文学经历有关。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。

(作者单位:南开大学文学院)

论北宋中期词的变化

北宋英宗、神宗、哲宗时期,围绕变法而生的新旧党争及相关的人事起废,在士大夫的词中留下了感情记录,“叹官路飘零,荏苒年华”成为重要主题。因仕途坎坷而以理化情,词中言事理、物理渐多,又受参禅问道影响,形成了特有的理趣。苏轼以柳永俗词为对立面进行雅化改革,而由于传播与接受的原因,加以禅宗影响,诗文既尚雅又见雅俗结合。词人所作,兼备雅俗,王安石、黄庭坚、秦观等人也都有不少俗词。

(作者:邓乔彬 摘自《文艺研究》2008年第11期)

